

我与萨马兰奇先生的一次邂逅

本报老年记者 段家模

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28年前,我与国际奥委会原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次邂逅时时浮现在眼前,他那和蔼可亲、优雅随和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时光追溯到1993年,当时,我在焦作某电缆厂工作,分管设备、制造安装,因工作需要,我从诺基亚公司引进一套光纤光缆设备,为了能够熟练掌握操作方法,当年11月份,我和技术人员一行十人前往瑞士诺基亚公司总部考察学习,为时15天。在瑞士学习的日子里,我们住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总部附近。一天,工作之余,我们一行怀着对奥林匹克精神无比崇敬的心情,相约前往奥林匹克博物馆参观。

欧洲的冬天尽管寒气逼人,但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心情非常愉快。10时左右,我们走进了奥林匹克博物馆。这座欧式建筑风格的博物馆气势恢宏,展出的内容都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有图片、有实物,记载了奥林匹克从起源到发展到全世界最大规模和最具影响的体育运动历史,意义深远。我们难得有机会零距离了解奥林匹克文化,领略

奥林匹克精神,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是一名集邮爱好者,当然不会错过在那里购买奥林匹克纪念邮票的机会,当我们参观完博物馆走向售货厅时,迎面走来一位老人,老人是那样熟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立即在大脑里快速搜索起来,萨马兰奇?对,就是他!

我喜出望外,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但在异国他乡,相貌相似的人也是经常有的,我不敢确定。为了验证是否是他本人,我委托随行的翻译上前询问,通过交谈,证实他就是萨马兰奇。奥林匹克总部就在附近,萨马兰奇先生在总部工作,这天适逢周末,和夫人一起来这里转转。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们感到异常激动和兴奋,我们立刻围绕萨马兰奇先生交流起来。交谈中,萨马兰奇得知我们来自世界的东方中国时,他的脸上立即闪现出热情的光泽,竖起大拇指说:“中国OK!”向我们表示欢迎,并同我们亲切握手,真像他乡遇故知,大家热烈地交谈起来。当年9月份,

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萨马兰奇也主动谈到这个话题,表示非常遗憾,他相信中国肯定会有机会举办这样的盛会。

当得知我们准备购买奥林匹克纪念邮票时,他帮我们选购了一套四方联60分带有五环标志的奥林匹克纪念邮票、一套四方联80分带有瑞士国旗标志的纪念邮票、一套印有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纪念邮票,给我们同行的10位中国人每人一份。萨马兰奇先生让夫人拿出银行卡付了费,并和我们合影留念,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看着萨马兰奇夫妇远去的背影,我们仍然心潮澎湃,在原地逗留了很长时间,才依依不舍地回到驻地。这也是我们欧洲之行的一大收获,成了我们记忆中的珍宝。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转眼28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又即将迎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不仅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世界体育界的一大盛事,说明我们的祖国正在日益强大,有能力、有信心举办各种世界级盛会。

老年记者团给了我快乐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2011年5月,在刘学文老师的推荐下,我荣幸地加入焦作日报社老年记者团,成为一名老年记者。时间荏苒,光阴如梭,转瞬已10年。10年的老年记者生活,给了我幸福和快乐。

刘学文老师是第一批老年记者团成员,也是首批老年记者团写作班的一名老师。《焦作晚报》经常发表刘学文老师的佳作,这给了我极大启发和帮助。在写作方面我原来一窍不通,后来,我以刘老师为榜样,努力学习,力争也当一名合格的老年记者。我清楚地记得,在填写参加老年记者团申请表的那一刻,当我看到个人专长这一栏时,我却不知道如何下笔,我没有什么专长,不会演唱,不会跳舞,也不懂写文章的技巧,我思考了半天,我本人只爱好书画,所以填上了“书画”二字。对于书画这门艺术,我只是热爱而已。加入老年记者团的第一个月,我画了一幅牡丹书画作品投送到《焦作晚报》读者俱乐部版,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报纸刊登了我的作品,当时我欣喜若狂。从此,我投稿的热情无比高涨,每天宅在家里写字、画画。

经过自己的努力,我投送出去的书画作品,每个月在《焦作晚报》上能刊登一两篇。

后来,我试着学写文稿,也曾多次向刘学文老师请教,但由于自己写作基础较差,一开始,向报社投送数稿全都石沉大海。我不灰心,坚持写下去。2011年6月6日,《焦作晚报》读者俱乐部版刊登了我的一篇处女作,题目是《歌声响起多豪迈》,内容主要是写我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单位组织的歌曲大赛的故事。我参加老年记者团的头一年,《焦作晚报》刊登了我10多篇文稿,让我信心倍增。

10年来,老年记者团经常组织老年记者下基层,走访群众,到焦作红色基地学习,到老年福利院搞公益活动义务演出献爱心。为了提高写作班成员的写作水平,老年记者团多次举办文化培训,找名师授课,让我在文学创作方面感悟极深,受益良多。这些年来,在写作班老师的鼓励与帮助下,我先后有30多幅书画作品、100多篇文稿在《焦作晚报》艺苑版、晚晴版、读者俱乐部版刊登。

感谢老年记者团给予我一个愉悦、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的高小时代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1962年,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一天下午,我正在羊圈里挖粪,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告诉我考上高小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要知道,那年代的高小不亚于今天的高中,是山里娃梦寐以求的高级学府。

高小在村北两三公里处,教室设在明清时期地方政府用来办公的官房里,寝室和伙房是借用的民房,学生大都寄宿。那时我很幸运,因为外婆家就在学校附近,母亲便让我吃住在外婆家。

官房依山而建,门廊画柱,古色古香,庄严肃穆,后墙和村道平连。夏日的夜晚,老师们常在房顶上为我们讲故事,有时讲到《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怕学生胆怯,常常赶我们离开,只留下村里老乡。谁知越是怕,我们越想听,好奇心和神秘感常常驱使我在夜幕里悄悄来到房檐下偷听。听到那些花妖

狐魅、水鬼蛟神的离奇故事,着实令我毛骨悚然。果然,那天半夜我做了一个恶梦,后来胆量越来越小。一日下午放学后,我独自一人回家给病中的母亲送中草药,走到半路时已夜幕降临,正壮着胆子在崎岖的小路上往前走,朦胧中忽见前方有几个人手握棍棒、叉腰横立,凶神恶煞般拦住去路。我立刻停下脚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正在这时,我看见远处灯光闪烁,原来是父亲提着马灯来接我。近前看时,刚才那一幕原来是停放着一辆出了故障的手扶拖拉机。

那天父亲告诉我,世上本无什么鬼神,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再后来,语文老师又教我们学习了王充的《论衡》和范缜的《神灭论》,从此我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相信科学,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兢兢业业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梦境
谷茂安
摄

我的红薯情结

本报老年记者 杜同祥

进入冬季,农贸市场里到处都是红薯的影子,不由得让我想起年少时的生活,勾起了我的红薯情结。

“红薯饭,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红薯是杂粮,又是主食。早餐和晚餐都是红薯稀饭,孩子们上学也经常带着蒸红薯,偶尔改善一次生活,也离不开红薯。母亲先把红薯洗净,削皮,用锅煮熟,取出捣成红薯泥,加入玉米面揉成团,再分成一个个小圆团,用手掌压成饼,锅里倒少许食用油,烧七成热,下入红薯饼,煎

至金黄,外焦里嫩,香甜可口,有种别样的温暖在心中漾起。

知青年代,我们在田间劳动,小憩时总会有人拾柴火取暖,小伙伴们把红薯埋在木炭火中,烤得半生不熟就开吃,你争我抢,冒出的白雾中充满香味和快乐,既解决了“温”的问题,又解决了“饱”的问题,暂时满足一下饥饿的胃,算是劳动间隙的一个小插曲。

如果遇到下雪天,不用出工,知青居住点的同学一起动手,用红薯粉学做凉粉。我们先将红薯洗干净,磨成糊,再用细布过滤出细浆,滴到盆里沉

淀,待粉与水分离,小心地把水倒掉,晒干,即成白色细细的红薯粉。把红薯粉和水配比好,搅拌均匀成糊状,锅里的水烧开后,粉糊舀进锅里煮,沸后倒入盆中,冷却的固体就是凉粉。凉粉可以切条、切块,配上食盐、蒜泥、食醋、芝麻酱,无论热炒还是凉拌,都能让人“闻香下马”。

那年代,红薯让我们在生活困难时期填饱肚子,给我们留下了温暖的记忆,成为我们回忆过往的谈资,忆苦思甜既是一种精神享受,又是对当下幸福生活的一种赞美。